

十一届五中全会时,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刚传达下去,一部分人思想混乱。有人反对平反,认为违背了毛泽东思想;有人认为平反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。公开为刘少奇平反,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做好冤案昭雪的宣传工作。

胡耀邦指挥“为刘少奇冤案平反”舆论战

1980年3月12日,胡耀邦出席中宣部部长交接会。这是他最后一次以中宣部部长的身份作讲话。他特别嘱咐宣传系统在刘少奇平反昭雪宣传上要注意的问题。据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回年同志在其回忆录《重大事件亲历》一书中回忆:

胡耀邦同志早就给新华社打过招呼,要求抓紧准备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报道。中央要求写一组推翻强加在刘少奇同志头上“叛徒”、“内奸”、“工贼”三顶帽子的重头文章,在刘少奇追悼大会前发出。总社决定由我牵头,和几位政治记者一起完成这个任务。我们在中央组织部翻阅了所有重新调查取证的材料,抓紧时间,写出了《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——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》《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——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》《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——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》三篇长篇通讯。这三篇稿子送审后,于3月12日、16日、21日先后播发,全国各大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用,《人民日报》还在每篇稿件前加了很长的按语。这些按语,据说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加的。

3月23日,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协“二大”的全体代表之前,胡耀邦在休息

大厅里问华国锋: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?华国锋连说三个“好”,胡耀邦便说:“林彪、‘四人帮’控制舆论大权,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,发表了数百万、上千万篇文章,我们只用三篇文章就把他们的彻底推倒了。”

根据五中全会精神,《人民日报》要写一篇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,这是一篇难做的文章。社论要涉及毛泽东,涉及他在刘少奇冤案问题上的错误,同时还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。

《人民日报》以评论部主任范荣康为主的写作班子,前后花了70天,修改11次,最初送审稿标题为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——论刘少奇平反的重要意义》。1980年4月3日,代表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找《人民日报》负责评论工作的同志谈话,将社论原题目改为《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——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重大意义》,就社论主题思想,文章框架谈了他的意见。

社论最后经胡乔木修改后报送胡耀邦。1980年5月16日,在“五一六通知”通过14周年之际,《人民日报》为刘少奇平反发表社论,公开承认这是“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”,是“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”。

胡耀邦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为刘少奇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,并就召开的时间、规格等问题,和华国锋、邓小平等人多次进行沟通。在党内和社会上思想并不一致的情况下,及时举行追悼会政治意义重大。

在1980年4月初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,胡耀邦又一次提出了为刘少奇隆重召开追悼大会的问题。具体时间倒好商量,但按什么规格来办,却产生了不同意见。邓小平干脆地说道:“一切按国家元首逝世后的待遇搞,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。我们既然为刘少奇同志平反,就要拿出真正的大气势来嘛!”

5月17日下午,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,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参加了追悼会。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,正式宣布:“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,根据确凿的证据,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,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,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,恢复名誉。”5月16日是“文革”开始的日子,“文革”最大的“成果”之一是打倒了刘少奇。刘少奇追悼大会选在5月17日举行,具有强烈地否定“文革”的政治意义。(据《安徽日报》)

朱德德国打官司

1923年,朱德从柏林辗转回到哥廷根大学读社会学,后来任中国留学生会负责人。当时,他遇到了一桩官司:学生会的办公地是一幢小洋楼,一战后由于德国马克贬值,学生会当年只花了5美元就将这座小楼买了下来。等朱德当学生会负责人时,原来的房东到法庭起诉,要求赎回房子。接到传票后,中国留学生议论纷纷。有人说,这是周瑜打黄盖,一个愿打,一个愿挨;也有人认为,价格是低了些,可以再补一些钱给房东。朱德力排众议,主张将房子无条件退回给房东。他对党小组的同志说,帝国主义用战胜国贬低马克的办法掠夺战败国人民的财产,这是剥削行径。我们共产党人要坚决地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边。朱德作为留学生代表如期到法庭,他的声明出乎原告和法官意料:我们中国留学生抗议帝国主义以“道威斯计划”巧取豪夺德国人民的财产,所以,我们将无条件地归还房屋。

徐向前:还是留点余地好

1935年5月,红四方面军发动土门战斗。同时,红一方面军也进入了川康,两军会合是指日可待,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,研究迎接中央红军的工作,会上,陈昌浩提出“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”的口号,当时徐向前就提出,“恐怕中央红军没有那么多吧,还是留点余地为好”。但是,会后还是那样宣传的,标语也是那样写的,会师后的事实证明,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人,徐向前后来回忆说,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,弄得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议论纷纷。

粟裕:不会打牌下棋

被毛主席誉为“最会打仗”的粟裕大将,被人熟知的是“尽打神仙仗”,不被人知的是,他一到打仗,常常是几天几夜不合眼;终生不会打牌下棋,不会喝酒跳舞,最大的爱好是看地图,最大的追求是尚武,最向往的地方是战场;他6次负伤,3块弹片留在头颅里伴随他54年直至逝世。

张国焘:死是个时间问题

1976年,毛泽东去世,有人将这个�息告诉了张国焘,张长叹:“我们都年华消逝!我像毛泽东一样,是个总归要死的人,而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。”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,他说:“在中国舞台上,我以往是个演员,现在仅是个观众,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。”(本刊综合)

胡乔木一次汇报同时得罪两高层领导

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,1940年代颇受毛泽东信赖。新中国成立后,胡乔木明显感到他追随毛泽东的步伐有些力不从心。

《人民日报》被批“死人办报”

新中国成立之后,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,新华通讯社社长,还兼任《人民日报》社社长。

在1957年3月1日举行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,毛泽东谈到要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。《人民日报》却在此时发表了一篇《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》的文章。文章提出:“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,有许多人只热衷开老花,不注意开新花。在这种情况下,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 and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,越来越多人提倡了;反对‘公式化、概念化’也被用来作为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、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、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。”显然,该文的观点与毛泽东提倡的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是不相符的。毛泽东对此文极不满意,多次进行了批评。

既然是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这样的文章,作为《人民日报》社长的胡乔木自然难辞其咎。果然,不久,毛泽东就把胡乔木喊来,狠狠批评了一顿。他说:“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,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,而是死人办报。”这年4月下旬,毛泽东还将24日的《大公报》批给胡乔木,称《人民日报》“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”。

1959年庐山会议“有惊无险”

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后,彭德怀从7月3日到7月10日共作了7次激烈发言,

令毛泽东始料未及也十分不快。7月10日,毛泽东召集组长会议,讨论会议下一步安排。胡乔木任会议决议起草小组组长。彭德怀的发言使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发生改变,他正酝酿由“批左”转向“反右”,而胡乔木却对此一无所知,所以,他仍然过多地写了“大跃进”的缺点。结果,会议决议印发后招来不少批评,认为这份记录对“大跃进”的“成绩讲得不够”,而“缺点写得很具体”。

胡乔木于7月19日在分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,在接受批评的同时强调了揭露问题的重要性,呼吁与会者“畅所欲言”。当毛泽东准备“反右”时,胡乔木这番提倡讲真话、鼓励揭问题的发言,显得极为不合时宜。8月2日,毛泽东发表讲话,动员反对“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”,明确表示目前不是反“左”而是“反右”的问题。

幸好,胡乔木凭借8月10日的一次发言有惊无险地化解了这次危机。庐山会议时,彭德怀、张闻天、李锐在发言中曾提到毛泽东有点像“斯大林晚年”,胡乔木针对这一“谬论”,从六个方面加以批驳。胡乔木的这次发言,毛泽东极为满意。翌日,毛泽东在发言中表扬了胡乔木:“李锐不是秀才,是俱乐部的人。”“想把秀才们挖去,不要妄想,是我们的人。”这里的“俱乐部”是指彭德怀为首的“军事俱乐部”(反党集团的代称),“秀才们”则是指胡乔木、吴冷西、田家英、陈伯达。毛泽东这两句话是说李锐投靠了彭德怀,而其他几个笔杆子站在自己这边。

同时得罪毛泽东和刘少奇

1961年1月底,胡乔木遵毛泽东之命赴湘调查。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他去农村获得第一手材料以“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,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,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、污蔑和怀疑”,从而“长自己的志气,灭他人的威风”。然而,胡乔木送上的材料却让他大失所望——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而非农村所取得的业绩。不过,毛泽东仍然对胡乔木提供的材料很重视。胡乔木却把毛泽东的重视当作毛泽东又想反“左”的信号。1961年5月,当胡乔木结束调查赶回北京向主席汇报时,他为庐山会议纠“左”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,他还谈到,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“左”的文件建议。

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犯了两个错误:其一,庐山会议其时已经尘埃落定,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会议定性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,而他“却为庐山会议纠‘左’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”;其二,他不该把刘少奇未公开的建议私下汇报给毛泽东,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,客观上这样做会使两个高层领导产生误会或齟齬。

不久,中央召开会议,就在这次会议上,“胡乔木向毛泽东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准备建议搞一个反‘左’文件”的事传了出去。这件事引起刘少奇对胡乔木极大的反感。在会议上,“刘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”。结果,会议还没结束,胡乔木的老毛病——神经衰弱犯了,不得已,他向中央写了报告,提出长期病休。

(据《党史文苑》、《翻阅日历》)